

# 清代的国土圈层结构 ——以中亚战略为核心

张超亚

(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 与中亚地区形成直接接壤关系, 并逐步形成了一套以“满洲中心主义”为内核、以圈层结构为外在表现的中亚战略体系。该体系在乾隆时期基本形成, 虽经历嘉道以降内忧外患冲击, 但其基本逻辑延续至清末。通过梳理清后期汉文中亚文献可以发现, 清代中亚战略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 以哈萨克、布鲁特为第一圈层, 以浩罕、布哈拉为第二圈层, 以阿富汗、希瓦等地为外围圈层, 由此形成“六元八域”的国土—民族认知体系。

本文认为, 清代中亚战略虽然并非近代意义上的系统战略规划, 但其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了以民族关系为基础、区别于英俄殖民扩张模式的边疆认知体系。清代中国对于中亚的认识, 并非单纯以地理疆界为依据, 而更多依托民族分布、政治关系和文化联系划分内外, 从而形成一种具有“民族本位”特征的边疆观念。与此同时, 本文提出“认识论诠释学”方法, 认为清代中亚文献不仅是客观历史事实的记录, 更是清人认识世界方式的体现, 应从思想史角度分析其背后的认知结构及其历史局限。

**关键词:** 清代中亚战略; 圈层结构; 六元八域; 满洲中心主义; 认识论诠释学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esd.v1i2.1615>

## 一、清代中亚战略的形成过程

清朝对中亚地区的战略定位, 并非自始即明确, 而是在统一战争、边疆治理和国际环境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不同皇帝由于个人经历、政治理念以及时代环境不同, 对国家战略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

康熙时期, 清朝主要面临三藩、台湾、准噶尔以及沙俄等多重挑战。康熙帝具有较强的军事主动意识, 但其战略更多体现为针对具体危机的应对模式, 并未形成完整的国家边疆战略体系。清朝此时主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整合能力, 逐步解决内部和外部问题。<sup>[1]</sup>

---

**作者简介:** 张超亚 (1989-), 男, 馆员,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史, E-mail: zhangchaoya1@163.com。

**基金项目:** 无。

雍正时期，国家战略更加偏向内政整顿。由于执政时间较短，且准噶尔和沙俄威胁尚未达到最高程度，清朝对外战略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保守性。雍正时期与俄国划定边界，也体现出通过外交手段减少外部冲突的倾向。<sup>[2,3]</sup>

乾隆时期是清代中亚战略形成的关键阶段。乾隆帝继承康熙时期基础，通过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以及处理大小和卓问题，实现了清朝疆域的大规模扩展。在这一过程中，清廷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藩部”“外国”的层级认知，并以“满洲中心主义”为基础构建出一种圈层式边疆体系。<sup>[4]</sup>

乾隆时期形成的战略框架，对之后清代中亚政策产生长期影响。嘉庆、道光时期虽然面对内外危机，但基本延续乾隆时期的边疆认识。鸦片战争虽然改变了清朝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却并未立即改变其中亚战略。其原因在于，清廷的国家安全认知仍以核心区域和传统边疆体系为中心，对于远离政治核心的海洋权益和海外利益关注有限。<sup>[5]</sup>

咸丰时期，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英法俄等列强压力，使清朝传统边疆体系受到严重冲击。洋务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清廷开始调整传统战略，但在中亚方向，由于俄国尚未完全深入、英国又受印度民族起义影响，清廷仍未形成有效预防机制。

同治、光绪、宣统时期，清朝进入被动近代化阶段。由于中央权力削弱，传统“满洲中心主义”逐渐转变为以京师安全为核心的防御思想。虽然左宗棠收复新疆避免了更大领土损失，但清朝在中亚方向已基本由主动经营转向被动维持。<sup>[6]</sup>

与英国、俄国相比，清代战略最大的特点在于连续性不足。英国依靠近代国家制度和资本利益推动海外扩张，其战略具有明显延续性；俄国则基于地缘政治需求持续向南、向东扩张。而清朝的中亚战略更多依赖皇帝个人判断，缺乏长期制度化设计。因此，在19世纪国际竞争环境下，清朝逐渐失去中亚方向的主动权。不过，清代中亚战略并非完全不存在，而是在传统政治体系和民族关系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边疆认知模式。这一模式的具体结构，需要从清代中亚文献中进一步分析。<sup>[7-10]</sup>

## 二、清代中亚战略的基本面貌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清代国家战略研究相对不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清代缺乏类似英国、俄国那样明确的近代战略规划。因此，有观点认为清代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但从清代中亚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清朝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战略理论，却形成了一套具有内在逻辑的边疆体系。这一体系以“满洲中心主义”为核心，在中亚方向表现为典型的圈层结构。<sup>[11]</sup>

所谓“满洲中心主义”，并非简单指民族优越思想，而是指清朝统治体系以八旗制度和满洲政治传统为基础，将不同民族按照政治关系、治理方式和距离核心区域远近进行层级划分。<sup>[9,12]</sup>

清朝与中亚直接接触，是在平定准噶尔、统一天山南北之后形成的。随着新疆纳入清朝统治范围，哈萨克和布鲁特成为清朝西部边疆的重要民族。清人认为，哈萨克、布鲁特既是新疆外围的重要屏障，也是区分“中国”与“中亚”的关键界线。<sup>[13-14]</sup>

因此，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哈萨克和布鲁特具有特殊地位。二者既不同于完全属于清朝内部治理体系的新疆各民族，也不同于浩罕、布哈拉等外国政权，而处于一种介于内外之间的边疆圈层。乾隆时期，清廷没有将哈萨克、布鲁特纳入盟旗制度，而是保持其原有部落结构。这一政策并非简单由于宗教、语言差异，而是与清朝整体边疆治理理念有关。清代边疆治理强调“因俗而治”。对于蒙古、西藏、新疆内部民族，清廷通过八旗、盟旗、伯克等制度加强控制；而对于哈萨克、布鲁特等处于更外围的位置，则采取较为松散的关系模式。<sup>[15-16]</sup>

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朝边疆体系的核心目标并非无限扩张，而是维护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东

北、蒙古、新疆、西藏、西南等地区形成不同层次的制度体系，其共同作用是构成围绕核心区域的安全屏障。哈萨克和布鲁特正属于这一体系之外的缓冲区域。清廷希望通过保持其自治状态，使其发挥隔绝俄国、中亚其他势力的作用，而不是将其完全纳入直接治理范围。

同时，清朝的交通和后勤条件也限制了其进一步向中亚腹地扩张。新疆治理依赖从内地经甘肃、河西走廊到伊犁的补给体系，将控制范围进一步推进至巴尔喀什湖以西，需要承担巨大行政和军事成本。因此，清朝最终形成了以自然地理和民族分布为基础的边疆范围。<sup>[17]</sup>

从这一角度看，清代中亚战略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结构：第一层为哈萨克—布鲁特地区。这一地区与新疆直接相连，在清人认识中属于“中国与中亚之间的过渡区域”，具有较强的内部联系。第二层为浩罕—布哈拉地区。这些政权与清朝存在外交往来，但属于典型的中亚政治空间。第三层为阿富汗、希瓦以及土库曼等区域。这些地区距离中国较远，交通阻隔明显，在清代文献中记载较少，属于外围区域。由此形成了清代中亚战略的基本结构，即以北京为中心，通过新疆向外展开的多层次圈层体系。<sup>[18-19]</sup>

清代中亚战略的核心，并非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以北京为中心，通过不同层级的政治关系维持边疆秩序。因此，其基本结构可概括为“圈层结构”。

这一结构首先体现为对“内外”的区分。清朝统一新疆后，将哈萨克、布鲁特视为连接中国与中亚的重要区域。二者虽然未完全纳入清朝内部治理体系，但在清人认知中具有明显的“中国属性”。这一认识既来源于长期民族联系，也来源于清朝对准噶尔战争后的政治继承。<sup>[12-13]</sup>

与之相比，浩罕、布哈拉等中亚政权，则属于清代朝贡体系中的外部政治力量。清人虽然与其保持外交关系，但并不认为其属于中国疆域范围。而阿富汗、希瓦以及更远地区，则由于距离遥远、交通阻隔，在清代文献中更多以外围世界出现。<sup>[14,18]</sup>

因此，清代中亚战略形成了由近及远的三个层次：第一层，即哈萨克—布鲁特圈层。这是清朝西部边疆最重要的缓冲区域，也是新疆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廷并未采用直接统治方式，而是通过朝贡、贸易和政治联系维持关系。第二层，即浩罕—布哈拉圈层。这一区域属于典型中亚政治空间，与清朝存在边境交往，但其政治主体被视为外国。第三层，即阿富汗—希瓦等外围区域。这些地区距离中国核心区较远，与清廷联系较弱，是传统朝贡体系中的边缘部分。<sup>[19-20]</sup>

这一圈层结构的形成，与清代整体边疆治理模式密切相关。清朝并不追求完全按照现代民族国家方式划定疆界，而是通过政治关系、民族联系和制度安排形成多层次空间秩序。从更大的范围看，清代边疆治理具有明显的“包裹结构”。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西南等地区构成外围屏障，而汉族传统农业区域则处于核心位置。八旗、盟旗、伯克、土司等制度，共同维持了这一体系。

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中亚战略虽然缺乏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战略设计，但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逻辑的边疆认知体系，即以民族关系和政治联系为基础的圈层秩序。<sup>[9,21]</sup>

### 三、清代中亚战略背后的中国多元一体发展史

通过前文对清代中亚“圈层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结构实质上是以北京为政治中心、以八旗体系为基础，在民族关系与边疆治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空间秩序。围绕汉族核心区域，东北、蒙古、西北、青藏、西南五大边疆区域分别形成了具有地域特点的“民族、边疆、军事、治理”体系。

从自然地理和民族分布来看，清代疆域整体呈现出以北京为中心、向外围展开的圈层结构。其边界大体依托山脉、河流和民族分布形成，从东北山地、蒙古高原、新疆山地，到青藏高原和西南山区，构成相对完整的陆地边疆体系。这种边疆形态并非完全依靠人为划定，而是在长期历史演进、民族交流和政治整合过程中形成。<sup>[11]</sup>



本文将这一特点概括为“科学边疆”。需要说明的是，“科学边疆”并非清代原有概念，而是本文用于描述清代边疆形成规律的分析性概念。其核心含义在于：清代边疆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然地理条件、民族分布格局和历史联系相结合，体现出较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与近代欧洲殖民体系下以势力范围和政治利益为中心的边界划分不同，清代边疆形成更多依赖民族关系和政治整合。清廷在处理中亚民族关系时，并非简单依据山川划界，而是重视民族归属、历史联系和政治认同。例如，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等民族，在清代文献体系中长期被视为与新疆联系密切的民族群体。<sup>[12、21]</sup>

从清代中亚文献来看，清人对于中亚的认识虽然存在地理和民族信息不足的问题，但其基本结构逐渐清晰。随着准噶尔战争结束以及新疆纳入清朝治理体系，清代中亚认知逐渐形成以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区域认识。其中，以哈萨克、柯尔克孜和帕米尔地区民族为代表的群体，被认为与新疆具有密切联系；而以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为主体的河中地区，则更多被视为中亚外部区域。<sup>[18,21]</sup>

因此，清后期中国人的中亚认知具有明显的“民族本位”特征：新疆与中亚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形成“内外相连、边界分明”的关系结构。新疆内部，以满、汉、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共同构成治理体系；新疆之外，则形成以浩罕、布哈拉、希瓦等政权为主体的外部空间。

这一认识体系的形成，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经历了长期历史演进。至清代后期，无论官方文献、历史地理著作，还是知识群体的相关论述，均逐渐形成对中国整体空间结构的认识。这种认识虽然存在时代局限，但其基本框架在清末“五族共和”以及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从这一角度看，清代中亚战略并非孤立的边疆政策，而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sup>[22-23]</sup>

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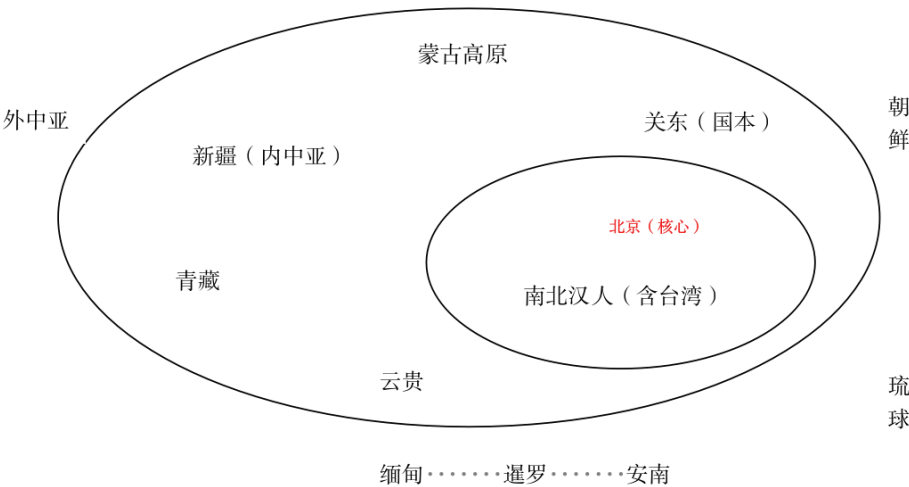


图1 清代多元一体“圈层结构”示意图

（一）东北地区：清朝政治根基

东北地区是清朝国家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满洲兴起之地。该区域大体以黑龙江流域、辽河流域及周边地区为范围，民族结构以满—通古斯民族为主体，同时包括汉族、朝鲜族等。清代通过八旗制度、驻防制度等方式强化对东北地区的控制，使其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支撑。<sup>[24]</sup>

（二）蒙古高原：连接北疆体系的重要区域

蒙古高原是清代边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盟旗制度、宗教政策以及政治联姻，清廷逐步将漠南、漠北和部分漠西蒙古纳入国家体系。蒙古高原不仅具有地理意义，也是连接东北、新疆和内地的纽带。其稳定对于清代北部边疆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 （三）新疆地区：中亚战略核心区域

新疆是清代中亚战略的核心。乾隆时期平定准噶尔、统一天山南北后，清朝建立了对新疆地区的治理体系。新疆具有复杂民族结构，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以及汉、满、锡伯等民族。清廷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实行差异化治理：南疆以维吾尔民族为主体，主要实行伯克制度；北疆为准噶尔旧地，民族结构更加复杂，通过驻军、屯田和多民族治理维持稳定。因此，新疆既是清代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中国与中亚的关键区域。从“六元八域”结构看，新疆“一元两域”，即新疆整体构成一个区域，同时内部又存在南北疆差异。这体现了清代边疆治理对于地域和民族差异的认识。

### （四）青藏高原：西部边疆的重要屏障

青藏高原以藏族为主体，同时包括蒙古及其他民族。清廷通过宗教政策、政治制度和军事安排，加强对该地区的管理。在清准战争过程中，清朝逐步削弱准噶尔势力在蒙古高原和青藏地区的影响，实现了对西部边疆的重要整合。相比新疆，青藏地区与中亚联系较少，因此其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维护西部整体稳定。

### （五）云贵高原：民族治理的重要区域

云贵地区在元明时期已建立行省制度，但地方民族结构复杂。清代通过改土归流，加强中央行政体系建设。与新疆、蒙古、青藏相比，云贵地区与内地联系更加紧密，但其民族多样性仍使其成为清代地方治理的重要区域。

### （六）汉族核心区域：国家主体空间

上述边疆区域共同围绕汉族传统居住区域形成包裹结构。该区域是清代中国经济、人口和文化中心，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因此，清代“六元八域”结构可以概括为：以汉族核心区域为主体，以东北、蒙古、新疆、青藏、西南等区域构成外围体系，通过不同制度实现多民族国家整合。

从整体结构来看，清代历代统治者修纂《一统志》、经营边疆，其目的在于维护这一多元一体空间秩序。然而，清代边疆体系中也存在薄弱环节，其中中亚方向尤其突出。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变化，不仅影响新疆安全，也改变了中国与中亚之间的联系结构。随着19世纪中后期俄国势力进入中亚，清代传统的中亚圈层结构受到破坏。部分哈萨克、柯尔克孜和帕米尔地区民族逐渐成为跨境民族，新疆与中亚之间原有联系受到削弱。因此，中亚在中国整体战略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更体现在民族联系、丝绸之路交流以及国家统一结构方面。清代中亚战略的形成，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sup>[22,24]</sup>

## 四、文献研究背后的“认识论诠释学”

通过对清后期中亚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重要问题：清人记述的中亚、西方人眼中的中亚以及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中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来源于技术条件、知识水平的不同，更与不同文明主体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

清代虽然没有形成近代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边疆”理论，但基于“六元八域”和圈层结构形成的边疆认知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地理、民族和政治关系的综合认识。因此，清代中亚文献不能简单视为对客观世界的记录，而应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思想材料加以研究。

基于此，本文提出“认识论诠释学”的研究方法。所谓“认识论诠释学”，是指将文献视为客观事实

与主观认识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研究文本内容的同时,关注文本背后的思想结构、认知方式及其历史演变。换言之,文献不仅记录“发生了什么”,也反映“当时的人如何理解世界”。

运用这一方法研究清代中亚文献,可以避免单纯以现代知识标准评价传统文献,而是在历史语境中分析其价值。即使清人对于中亚地理、民族和政治存在认识偏差,这些偏差本身也具有思想史意义,因为它们反映了清代中国对于域外世界的认知边界。

从方法论角度看,中亚文献研究可以综合运用宏大叙事、碎片化研究、还原论以及认识论诠释学等多种路径。

“宏大叙事”强调从大量文献中总结历史整体趋势。本文通过比较《大清一统志》等不同文献中关于哈萨克、布鲁特等民族的共同认识,进一步提炼出“圈层结构”“六元八域”等整体性结论。其价值在于突破单一文本限制,从历史材料中发现长期稳定的认知模式。

“碎片化研究”则强调对具体文本、版本、制度和名物进行细致分析。虽然其研究对象往往较为微观,但大量碎片化成果能够为宏观认识提供基础。从认识论角度看,宏大叙事与碎片化并非完全对立,前者侧重对文献背后思想的整体把握,后者侧重对具体材料的深入分析,二者共同服务于历史认识的构建。

“还原论”强调通过史料考证最大程度接近历史事实。这种方法对于具体事件、人物和制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在文献研究中,文本本身并非完全客观的历史复制,而是作者所处时代、身份和认知方式的反映。因此,单纯追求事实还原,容易忽视文献作为思想载体的意义。

相比之下,“认识论诠释学”更加关注文献背后的认知过程。以清代汉文中亚文献为例,如果仅从还原历史事实角度出发,部分文献可能存在信息不足、记载偏差等问题;但从思想史角度看,这些文本恰恰真实反映了清代中国人如何理解中亚、如何划分内外、如何认识民族关系。

因此,清代中亚文献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其是否准确记录19世纪中亚事实,更在于其展现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方式。通过认识论诠释学,可以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域外认知连接起来,观察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中的延续与变化。

综上,认识论诠释学并非否定史料考证,而是在史料基础上进一步追问文本背后的思想逻辑。对于清代中亚研究而言,只有同时关注“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清代中亚战略、边疆体系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过程。

##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 参考文献

- [1] 清圣祖实录 [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 清世宗实录 [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4] 清高宗实录 [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5] 清宣宗实录 [M].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6] 牛海桢. 清代西北边疆政策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 [7] 何秋涛. 朔方备乘 [M]. 清光绪年间刻本.
- [8] 许建英. 近代英国对新疆的侵略与新疆之命运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 [9] 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M]. 唐晓峰,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10] 巴托尔德·中亚历史 [M]. 张锡彤, 张广达,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11] 王希隆·清代西北史地研究 [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
- [12] 米华健·嘉峪关外: 1759—1864 年新疆的经济、民族与清帝国 [M]. 贾建飞, 译.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7.
- [13]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M]. 钟兴麒, 等, 校注.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 [14] 七十一·西域闻见录 [M].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藏抄本.
- [15] 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6] 齐清顺·清代新疆政治制度研究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 [17] 徐松·新疆识略 [M]. 清嘉庆年间刻本.
- [18] 马大正, 冯锡时, 主编·中亚五国史纲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 [19]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 [M].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20] 苏尔德·回疆志 [M]. 清乾隆年间抄本.
- [21]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 [22] 黄兴涛·“五族共和”论与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建构 [J]. 近代史研究, 2014(5).
- [23]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24] 钦定大清一统志 [M].《四库全书》本.